



新作更注重细节与真实

记者：首先请谈谈您创作这部作品的缘由或契机，为何给这一对君相立传？相较于同类作品，您这部书有哪些特点？

吴钩：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的缘由，我在写上一部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规划，当时就想写四部北宋皇帝的传记，一位是宋仁宗，在2020年已出版；第二部是《宋神宗与王安石》，今年9月份推出；下一部要写宋太祖，最后再写宋徽宗，通过写这四位北宋的皇帝，把北宋历史串起来。

图书市场上，关于王安石变法题材的书有很多，这是个热门题材，关于神宗皇帝的书很少。但是如果谈到神宗朝，那肯定绕不开王安石，也绕不开王安石变法这么一个重要事件。相比同类题材的其他图书，我个人认为比较突出的一个不同就是，其他同类作品一般都采取鸟瞰式的视角，对王安石变法的大体过程与大致内容，做比较粗线条的勾勒，一般都是概括性的；然后再对变法的利弊、功过进行评价。

我的写法是回到历史现场，更加细致地把变法的全过程、它的全景图描绘出来，我更注重去捕捉变法过程里面的一些生动的细节，去讲清楚王安石变法到底是怎么推行的，过程中受到了哪些阻力，当时所谓的保守派与变法派是怎么博弈的？保守派提了哪些看法，变法派又做了哪些应对？王安石做了什么事？又有哪些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王安石做的，但其实王安石并没有那么做，他的对手又做了什么事？做了一些澄清。

整个过程很有画面感与情节性，这个情节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，故事性比较突出。阅读感受上，读我这本书类似在看一部电影或者连续剧；如果看其他的写王安石变法的图书，可能会像在看比较严肃的政论片。这是我这部书跟同类作品相比最明显的一个特点。

记者：请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，您如何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史料文献中爬梳和择选材料？

吴钩：我要还原当时变法的整个过程，要写王安石宋神宗这一对君相的跌宕一生，那肯定要按史料来写，虽然我注重情节性或故事的冲突，但没有一个地方是虚构的，全都是史实。包括人物的对话，我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引用史料的，没有一句对话是我凭空想象出来。这就必须要依靠大量的史料了，好处是史料还是很丰富的，并不很难找。

我主要参考了三类史料。最重要的参考，史料价值最高的是南宋李焘的《资治通鉴长编》，里面收录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比较多，包括神宗朝实录。但有几个年份遗失了，需找相关材料弥补；南宋杨仲良根据长编做了《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；清代学者对史料进行整理，汇编为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。其二是宋朝时人文集，如《王安石文集》《苏东坡文集》等。其三是宋代笔记小说，宋代文人的笔记小说很多，大象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宋人笔记，但笔记小说可靠性比较低，尤其北宋后期至南宋，批判王安石变法倾向性明显，需对比官修史料辨析使用。

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宋朝制度的原始资料，如《宋会要辑稿》涉及到宋朝一些基本的政治、经济的一些政策、制度，这些都必须参考。

概括地说，我的这部新书参考的史料还是很多的，甚至可以夸一下海口，我个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叙述是非常公正的，并不是说为了吹王安石变法，或者为了批王安石

□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

“吴钩说宋”系列第六本《宋神宗与王安石：变法时代》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“宋史热”推手、“中国好书”《风雅宋》作者吴钩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写作，讲述千古君相宋神宗与王安石的跌宕人生，全景再现那场激荡11世纪、闪耀至今的变法大潮，勾勒出宋神宗时代的文官群像与政治生态，解析了北宋帝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。9月7日，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，吴钩表示，与其他同类作品相比，本书在创作过程中更注重情节性，但立足史实无一处虚构，人物对话都是按照史料原汁原味呈现。吴钩强调，怎样看待王安石变法、怎样评价宋神宗与王安石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对他们的评价应建立在史实之上，尤其公众言说，不能仅凭个人好恶臧否人物。

石变法去做一些倾向性很明显的评论，我争取以一种比较公允、公正的态度来看待和书写那段历史。

爱宋朝纯属个人爱好

记者：您的“吴钩说宋”系列出到第六本了，为何对宋朝情有独钟？在您看来，宋朝文明何以迷人？

吴钩：我爱宋朝纯属个人爱好，按我的了解，宋朝呈现给我的，无论是制度、社会面貌、经济、商业，还是文化、生活等，与我个人的价值观、审美、兴趣更吻合，所以就变成一种动力，驱动我将精力花在这上面。

“宋朝文明”这个词概括性太大，很难说透，可以分成很多方面说。司法文明方面，宋朝的法律系统非常完备，套用现在的说法，可以说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呈现。宋代的立法是非常繁密的一个体系，非常完备、非常周密，司法过程非常讲究程序，有非常繁复的程序，有专业的职业化法官，在宋代要当法官一定要通过司法考试。

商业发展方面，明清时民间商业繁荣，但官府警惕或压制，或不闻不问，很少助力推动商业发展。这是很多朝代最常见的官方态度。而宋朝官方高度重视商业发展，利用政府力量帮助市场开拓。这是因为宋朝的税收结构与其他朝代不一样。其他王朝的税收大头来自于农业税，农业税起码占70%以上；而宋朝来自商业的税收，包括国家的专卖收入占了70%以上，农业税才占30%以下。宋朝的税收结构刚好跟其他王朝税收结构颠倒过来了。朝廷为了能够收到更多的商税，必须去维护市场、开拓市场，主动积极发展商业。宋朝的“重商”传统始自宋太祖，是太祖立国之后顺应大势之举。

精神、文化上，谈及古典文学绕不开唐诗宋词，宋词是古典文学另一座高峰，一个革命性的发展。唐诗都是唐朝受过教育的大诗人创作的，门槛是很高的；市井文化在宋以前比较微弱，宋代可谓出现了通俗文化的大爆发，出现了专门为市民日常文化享受进行创作的人，如柳永给歌伎写词，“凡有进水处，皆能歌柳词”，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歌曲。到宋朝中后期，苏东坡这些大文人介入之后，宋词才独立成为一个比较高雅的文体。

宋朝还有一些民间文艺，如说书的，杂剧表演，都是在宋代城市里面蓬勃发展起来的。宋朝的绘画作品也常可见画市井面貌的作品，最有名的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所以说，宋朝司法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经济、商业等都有突出表现，是最接近于今天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时代。

立足史料评价事件或人物

记者：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不断，您持怎样的观点？对王安石与宋神宗有何评价？照丰变法缘何被认为是近代化的转型？

吴钩：王安石变法自古争议不断，很多人批判或赞成，在我看来都是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立场，很少有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前后过程、它的具体主张、当时遇到了什么阻力、推行的整个过程、整个细节了解之后做出判断。我个人建议，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王安石变法，都应建立在史实之上，先去真正了解相关史实。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应建立在史实之上，尤其公众言说，不能仅凭个人好恶。

我在《宋神宗与王安石》一书的叙事过程中是比较克制的，没有使用情绪化、倾向性词语，最后有一些观点要表达，就写一篇

两万多字的结语，“补充说明”阐述了我的观点，对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做了个人评价，不知道是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，这个留待读者评价。

至于我对王安石变法、或对王安石与宋神宗怎么评价其实并不重要，因为它只代表了我个人的看法，你也可以坚持你自己的看法。只要保证讲述的事情是真实的，是有史料记载的，比对之后可靠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。

记者：相较于我们从历史教材上了解的内容，您在书中是否给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“双男主”？变法过程中，宋神宗和王安石个人性格及能力是否起到了重要或关键作用？

吴钩：很难这么说，因为我不知道每个读者心目中的王安石变法是怎样的，到底有没有跟我一样，这个很难说。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，我讲述的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故事是真实的，王安石变法整个过程是非常详细的。我不是事先预定人设，然后根据这个人设去裁剪资料，肯定不是这样子，而是先把他们的故事讲完，让读者自己去判断。

神宗皇帝继位时20岁，是个青春热血的年轻人，有冲劲有魄力，想改变国家穷困危机四伏的现状，君相达成共识推行变法，他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支持者。新法能推行首先离不开神宗皇帝的支持。

王安石固执、执拗，认死理，但性格百折不挠，因而能全力以赴推动变法；但因其执拗也未顾虑当时的反对意见。看书后你会知道，王安石的人格魅力很大，几乎没有道德瑕疵，不贪财、不揽权、不享受、不好色，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理想形象。而且口才很厉害，针对反对派提出的某个论点，从事实的角度、从逻辑的角度进行反驳。这个反驳我个人特别佩服。

记者：您创作过多部关于宋朝历史的书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宋感兴趣的？最初有过构建自己的“宋史江湖/世界”这样的构想吗？您最感兴趣/喜欢的人物有哪些？

吴钩：大概20年前开始写宋朝历史，起初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规划，是在写了第一本之后反应可以，又有未说完的话要说，于是写了第二本、第三本……写《宋仁宗：共治时代》时有了清晰的规划，要为北宋四位帝王立传，将北宋历史串起来。

我喜欢的肯定是我之前写过的这些人，比如有宋仁宗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宋神宗、苏东坡。苏东坡是一个缺点很明显、优点也很突出的人，前面的文章或多或少提及他，这一本《宋神宗与王安石：变法时代》里面，苏东坡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会登场；以后会专门写一部苏东坡的个人传记。

记者：当前创作规划可否透露一下？

吴钩：先完成计划中那两部作品，宋太祖和宋徽宗。

吴钩新作《宋神宗与王安石：变法时代》面世

重回历史现场 再现变法风云



吴钩